

中国利用外资区位条件的变化：基于中美制造业成本的比较分析

杨丹辉(研究员) 渠慎宁(副研究员) 李鹏飞(研究员)

DOI:10.14114/j.cnki.itrade.2017.09.010

随着劳动力、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攀升，加之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区位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逐步下降，表现为 FDI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达到高点之后（1995 年这一比值高达 15.65%），进入 21 世纪后持续快速回落，2010 年 FDI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 2.84%，2016 年则仅为 1.22%，而同期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也由超过 70% 下滑到 2016 年的不足 30%（29.3%）。值得注意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流，重振实体经济。近年来，美国鼓励制造业投资一些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投资者选择到美国投资制造业。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两国劳动力成本和能源价格的变动发现，中美制造业的要素成本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出我国利用外资传统区位优势弱化态势。

一、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比较

（一）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

1990—2015 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由 2073 元提高到

55324 元，16 年间劳动力成本上升了 26 倍。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由 28173 美元上升至 55292 美元，劳动力成本仅上升了 1.9 倍。其中，汇率波动是影响中美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因素。考虑汇率因素后，若统一按人民币计价，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差距在缩小，而且这种趋势在 2008 年之后更为显著（见图 1）。1990—2015 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增速基本保持在 10% 以上的水平，几乎一直高于美国（见图 2），美中之间制造业平均工资的差距已由 1990 年的 65 倍降至 2015 年的 6 倍。

（二）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产出比超过中国，吸引制造业投资的区位优势增强

1990—2015 年，美国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上升了 3.16 倍，而制造业人均工资仅上升了 1.91 倍，这使其劳动力成本产出比由 1.98 上升至 3.27，即每支付美国制造业工人 1 美元，可以创造的制造业增加值由 1990 年的 1.98 美元上升至 2015 年的 3.27 美元（见表 1）。相比之下，同期中国制造业人均增加值虽然提高到 24.73 倍，但由于同期制造业人均工资上升到 26.69 倍，导致劳动力成本产出比不升反降，由 2.59 降至 2.40，即每支付中国制造业工人 1 元人民币，可以创造的制造业增加值由 1990 年的

2.59 元降为 2015 年的 2.40 元。对比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产出比一直稳步提高的情况，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产出比则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驼峰”式变化过程（见图 3）。在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自 2008 年起，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已经低于美国，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可以通过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消化”其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反观中国，自 1997 年以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只能勉强“跟上”劳动力成本增速，劳动力成本产出比止步不前。随着 2008 年后制造业人均工资进一步上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产出比甚至出现下降。因此，从总体来看，目前投资美国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比中国更具“性价比”，这也是导致部分美国企业回流本土、一些中国企业“出走”美国的重要原因。

（三）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地区分化严重，其相对“落后”地区与中国的差距更小

进入 21 世纪，金融部门膨胀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美国各州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美国各州之间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以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哥伦比亚特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几乎是阿肯色州、密西西比

州、内布拉斯加州这些所谓“落后”地区的2倍（见表2）。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地区差距则明显小于美国。江苏、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省市的名义工资水平仅比西部的陕西、甘肃、宁夏高出10%~20%，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突出。由于2015年美国较为“落后”地区45000美元左右的平均工资较全美平均工资55292美元还低近20%，其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差距更小。再考虑到美国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加之美国部分州政府为吸引外国投资采取了税收、土地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未来一段时间美国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产出比优势将更为显著，或将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美国的首选地区。

（四）中美两国新兴产业的劳动力成本均享有一定的“溢价”

新兴产业的劳动力成本较高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特点。以ICT（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为例，2015年，美国ICT产业人均工资为67204.8美元，是制造业平均工资的1.25倍，而中国ICT产业人均工资达到112042元人民币，是制造业人均工资的2.03倍（见表3）。然而，相比美国ICT产业工资溢价倍数一直稳定在1.20左右的水平，中国ICT产业由于起步较晚，人均工资与制造业之间的差距更大，但随着时间推移，ICT产业的工资溢价倍数不断下降。这表明，ICT这类新兴产业，在产业发展初期为了吸引更多人才进入，会提供高于传统行业的薪资，但当产业逐步进入成熟期后，其与传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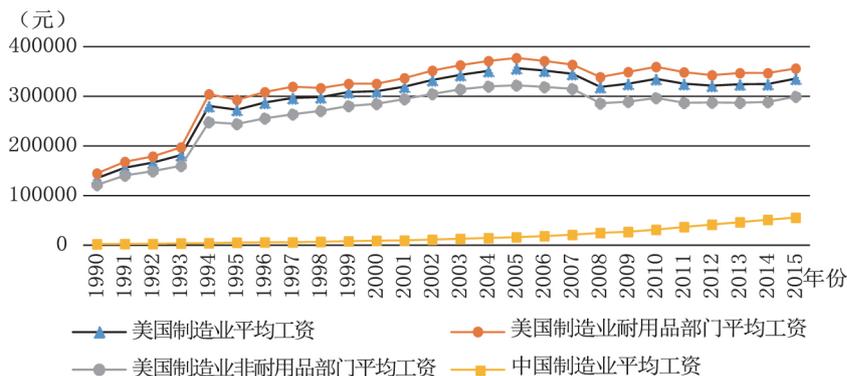


图1 1990—2015年中美制造业平均工资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美国劳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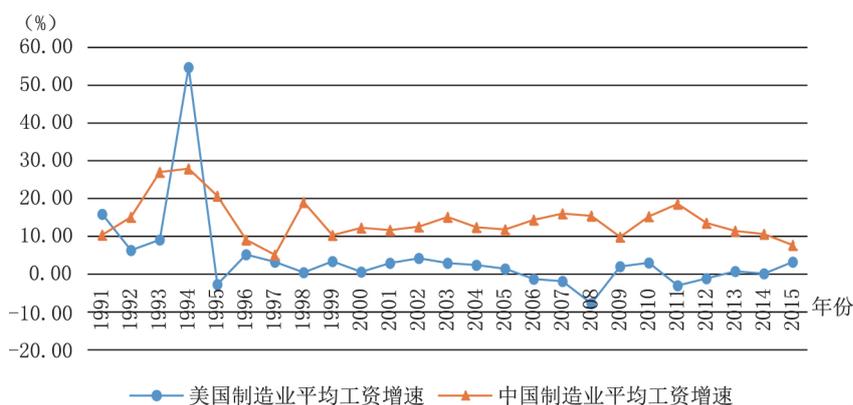


图2 中美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率比较（以人民币计价的增长率）

注：1993—1994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5.7大幅贬值至8.6，导致以人民币计价的美国制造业工资增长率在1994年飙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美国劳工部

表1 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

	美国			中国		
	制造业年人均增加值 (美元)	制造业年人均工资 (美元)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	制造业年人均增加值 (人民币元)	制造业年人均工资 (人民币元)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
1990	55699.91	28173.10	1.98	5375.27	2073.00	2.59
1995	68533.46	32673.33	2.10	17675.83	5169.00	3.42
2000	90524.42	37467.77	2.42	28302.67	8750.00	3.23
2005	120073.28	43501.75	2.76	51745.71	15934.00	3.25
2010	157878.40	49512.32	3.19	93388.33	30916.00	3.02
2015	176160.71	53856.92	3.27	132946.09	55324.00	2.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美国劳工部数据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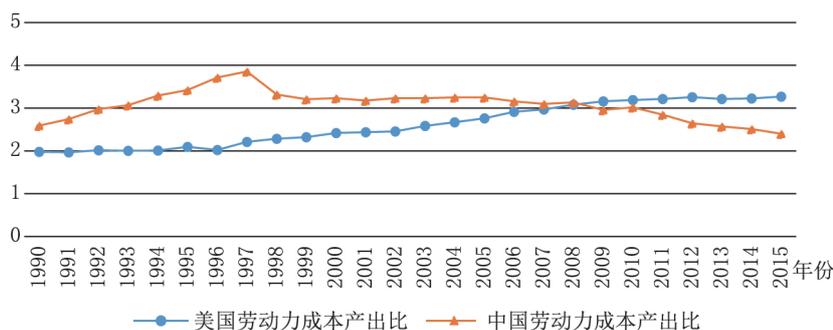


图3 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美国劳工部数据计算

表2 美国代表性州与中国代表性省区制造业平均工资

美国代表性州制造业 年平均工资 (美元)	加利福尼亚州	哥伦比亚特区	马萨诸塞州	阿肯色州	密西西比州	内布拉斯加州
2001	51213	63453	54451	29870	29419	32474
2005	59756	75770	62472	34210	34554	36569
2010	72561	84305	75202	39375	40476	42089
2015	83899	95801	86072	44580	46309	46827
中国代表性省区制造业 年平均工资 (人民币元)	江苏	广东	浙江	陕西	甘肃	宁夏
2001	10125	13512	12060	8242	9140	8686
2005	16937	18019	16446	13422	14930	13555
2010	32209	31277	29671	26015	28173	29560
2015	62731	57419	55370	51557	50458	51636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3 中美 ICT 产业劳动力成本比较

	美国			中国		
	制造业年 人均工资 (美元)	ICT 产业年 人均工资 (美元)	ICT 产业 工资溢价 倍数	制造业年 人均工资 (人民币元)	ICT 产业年 人均工资 (人民币元)	ICT 产业 工资溢价 倍数
2006	44151.64	52123.76	1.18	18225.00	43435.00	2.38
2007	45415.76	52880.88	1.16	21144.00	47700.00	2.26
2008	45873.36	55190.72	1.20	24404.00	54906.00	2.25
2009	47608.60	56750.20	1.19	26810.00	58154.00	2.17
2010	49512.32	59009.08	1.19	30916.00	64436.00	2.08
2011	50352.12	60388.64	1.20	36665.00	70918.00	1.93
2012	50963.12	60986.12	1.20	41650.00	80510.00	1.93
2013	52361.92	64029.16	1.22	46431.00	90915.00	1.96
2014	52893.36	65462.28	1.24	51369.00	100845.00	1.96
2015	53856.92	67204.80	1.25	55324.00	112042.00	2.03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效果初步显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3D 打印、无人驾驶汽车、高端机器人等一批具有颠覆性的前沿科技成果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在由初创向成熟演进的过程中，这些新兴产业往往对劳动力成本并不敏感。现阶段，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以便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掌控在企业内部，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形成利基市场，延长获利周期。而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对颠覆性技术投入巨大，必然会对每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及其产业化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因此，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从来不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展开，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为核心的固有比较优势与区位优势对新经济发展并不具备吸引力。

二、中美能源价格及成本的变化趋势

作为制造业重要的生产要素，能源价格高低及其变化趋势同样是影响制造业企业投资区位决策的关键因素。目前，在制造业企业使用的主要能源产品中，除原油成本中美基本相同之外，其他能源产品，中国的价格均显著高于美国。在中美制造业引资竞争中，美国能源价格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一) 中美两国电力成本的差距明显

从全国平均水平看，中国工业

用电成本比美国高 60%。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 9 月美国工业部门的终端用电平均成本为 7.15 美分/kWh。按 6.9 元人民币/美元的汇率折算(下同),约合 0.493 元/kWh。2016 年 8 月下旬,中国工业用电平均价格为 0.79 元/kWh,是美国的 1.6 倍。其中,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排名前 10 位的州中,有 9 个州的工业用电成本比中国工业电价水平最低的新疆还要低。另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美国制造业 10 强州占全美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56.71%。在这 10 个制造业强州中,除加利福尼亚州的工业用电价格(13.86 美分/kWh)较高之外,其余 9 个州的工业用电价格均低于 7.3 美分/kWh(见表 4)。换言之,美国绝大部分制造业强州的工业用电成本低于 0.5 元/kWh。与之相比较,2016 年 8 月下旬,在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中,工业用电价格最低的是新疆,为 0.51 元/kWh。中国工业增加值排在前 10 位的省份中,用电价格最高的是湖北的 0.91 元/kWh,最低的是河北 0.64 元/kWh(见表 4)。

(二) 受能源结构及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中国煤炭成本高于美国

尽管不同煤炭产品的品质和价格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可比性最强的电煤和焦煤看,中国工业企业的煤炭成本显著高于美国同行。首先,中国电煤价格的全国平均值是美国的 1.6 倍,电煤最高值中国略低于美国,最低值中国略高于美国。根据 2016 年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煤炭行业年报》(Annual Coal Report),美国电煤价格全国

表 4 中国工业 10 强省与美国制造业 10 强州的工业用电成本比较

中国工业 10 强省	工业电价 (元/kWh)	美国制造业 10 强州	工业用电成本 (元/kWh)
广东省	0.87	加利福尼亚州	0.96
江苏省	0.81	德克萨斯州	0.37
山东省	0.77	俄亥俄州	0.46
浙江省	0.82	印第安纳州	0.49
河南省	0.76	伊利诺斯州	0.45
河北省	0.64	北卡罗来纳州	0.46
辽宁省	0.86	密歇根州	0.50
四川省	0.81	宾夕法尼亚州	0.48
湖北省	0.91	纽约州	0.43
湖南省	0.83	华盛顿州	0.32

注:中国各省工业电价为 2016 年 8 月下旬数据,美国各州工业用电成本为 2016 年 9 月数据,并按 6.9 元人民币/美元的汇率折算。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取自美国能源信息署,中国数据取自中商产业研究院

平均值为 42.58 美元/短吨。按 6.9 元人民币/美元的汇率折算,约合 324 元/吨。在各州中,新罕布什尔州的电煤价格最高,为 97.56 美元/短吨;北达科他州最低,仅为 20.71 美元/短吨。2016 年 11 月,中国电煤价格全国平均值为 522 元/吨。在各省级行政区中,广西的电煤价格最高,为 712 元/吨;新疆最低,只有 166 元/吨(见表 5)。再从焦煤价格来看,中国的全国平均价格是美国的 1.44 倍,最高值是美国的 1.69 倍,最低值略高于美国。另据美国《煤炭行业年报》,其焦煤价格的全国平均值为 118.69 美元/短吨,约合 903 元/吨。在各州中,印第安纳州的焦煤价格最高,为 130.64 美元/短吨;俄亥俄州最低,为 118.44 美元/短吨。而在中国各主要地区中,西南地区的焦煤价格最高,达 1685 元/吨;西北地区最低,为 943 元/吨(见表 5)。

(三) 对比两国的油气成本发现,中美原油几乎没有价差,但中国成品油价格明显更高

由于国际原油市场高度一体化,加之中国的原油进口依存度很高,因此中国原油价格基本与国际市场联动。2016 年 12 月 21 日的时间截面上,美国西德克萨斯中级轻质原油(WTI)现货价格为 51.59 美元/桶;当天,中国的胜利原油现货价 51.47 美元/桶,大庆原油现货价 50.5 美元/桶。而从成品油市场看,2016 年 12 月 5 日,美国普通汽油零售价 2.208 美元/加仑,按 6.9 元人民币/美元的汇率折算,约合 5439 元/吨;当日美国公路用重型柴油零售价 2.48 美元/加仑,约合 4535 元/吨。2016 年 12 月 9 日,中国 93# 汽油零售价 7938 元/吨,97# 汽油零售价 8420 元/吨,0# 柴油零售价 6508 元/吨(见图 4),这意味着中国汽油零售价格是美国的 1.46~1.55 倍,柴油零售价格是美国的 1.44 倍。

表5 中美电煤、焦煤的价格比较

	全国平均		最高		最低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电煤 (元/吨)	522	324	712 (广西)	742 (新罕布什尔)	166 (新疆)	158 (北达科他)
焦煤 (元/吨)	1304	903	1685 (西南地区)	997 (印第安纳)	943 (西北地区)	901 (俄亥俄)

数据来源：美国电煤、焦煤价格数据取自美国能源信息署；中国电煤价格数据取自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中国焦煤价格数据取自万得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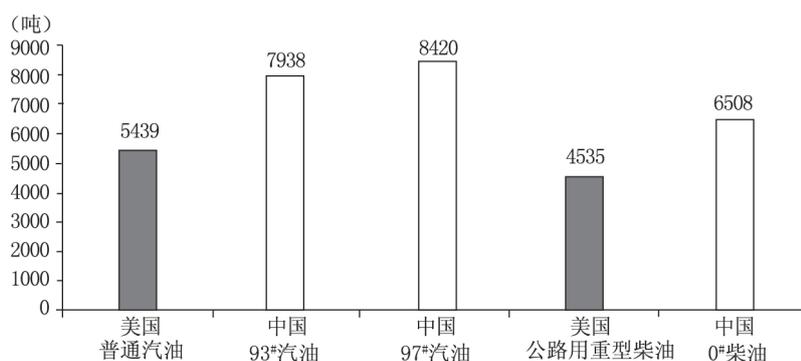


图4 中美汽油、柴油零售价格比较

数据来源：美国汽油、柴油价格数据取自美国能源信息署；中国汽油、柴油价格数据取自万得资讯

(四) 页岩气量产强化了美国天然气的价格竞争优势

近年来，“页岩气革命”的成功使美国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工业用气价格已由2008年7月的13.06美元/千立方英尺降至2016年9月的3.72美元/千立方英尺，8年内降幅超过70%。按6.9元人民币/美元的汇率换算，2016年9月美国工业用气价格约为0.91元/m³。国内目前还没有全国工业用气价格数据，在沿江、西南、西北、华南、华东、华北、东北等7个区域的工业用气市场价格中，2016年9月，西北地区的价格最低，为2.19元/m³，是同期美国工业用气价格的2.4倍；华南地区的价格最高，为

4.26元/m³，是同期美国工业用气价格的4.7倍（见图5）。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及主要能源价格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以劳动力、能源为代表的美中制造业主要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差距明显缩小，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高出中国，其主要能源品种的价格优势明显，对投资者形成了一定的吸引力。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成本攀升，以劳动力总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由逐步弱化加快转为系统性减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并发挥作用，在

很多领域发展动能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创新步伐加快、新兴产业群体性推进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其次，尽管中国制造业成本明显上升，但成本上升并未带来应有的福利效应。由于住房等生活成本激增，生产企业的一线员工普遍感受不到与工资上涨同步的福利改善，加之运营中遭遇的其他困难，进一步挫伤了国内外企业家继续投资中国实体经济的信心。再次，目前美国劳动力成本的总体水平虽然仍高于中国，但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制造业日益智能化、数字化，将对两国制造业的成本结构带来新的影响。可以预判，美国在智能化、数字化方面的领先优势将进一步抵消其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同时，更为现实的挑战是，一旦特朗普推动的“减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保护、放松环境规则、生产者主导的美国能源独立”等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美国吸引FDI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并将刺激全球投资向美国集聚，会对中国吸收高质量FDI形成更大的挤压效应。

(二) 利用外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应该看到，中国利用外资区位条件的变化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同时也受汇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伴随着这一过程，各级政府和企业对外资的追逐动力减弱，“外资偏好”出现下降的迹象。特别是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开发

区,当地外资存量较大,优惠政策空间被压缩,项目储备减少。同时,随着国民待遇的落实,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推动制度变革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日益开放的条件下,外商投资通过突破市场扭曲形成的制度创新效应日渐式微。

一方面,从国内市场的竞争态势来看,国内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在技术、市场、人才等各个环节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目前,这种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领域。在互联网经济、移动支付、云计算、共享经济等新兴领域,以华为、阿里、腾讯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其产品开发和技术水平以及运营能力不仅与在中国市场上的跨国公司不相上下,而且在全球市场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些企业对当下新经济发展以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商业逻辑重构有着不逊于跨国公司的理解能力和市场敏感度,研发投入力度大,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更灵活。相比之下,一些大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定位和策略明显滞后,仍然把中国作为区域运营中心,总体创新活跃度不足,岗位设置僵化,研发活动碎片化,技术导向偏于应用,致使本土的专业人才被固化在没有太多延展性和创造性的岗位上,其发展空间、薪资水平以及晋升制度,对高端人才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在部分环节的竞争中已经处于劣势。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国内企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加快,将由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的“跟跑者”、“模仿者”转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跨国公司将中国企业视为现实或潜在的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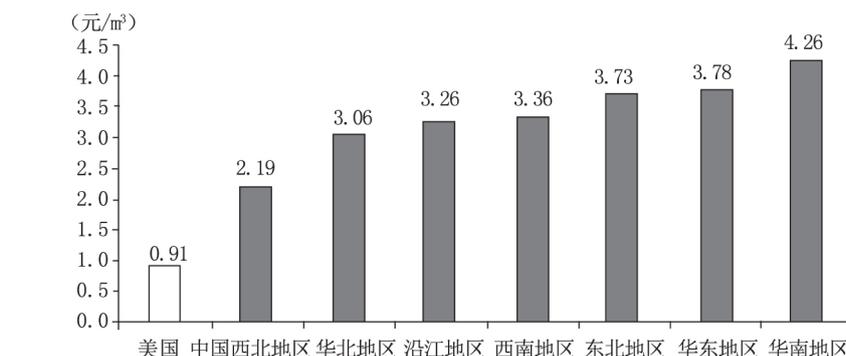


图5 中美工业用天然气价格比较

数据来源: 美国数据取自美国能源信息署, 中国数据取自万得资讯

争对手,双方基于传统合资合作方式的空间逐步缩小。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整体环境虽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扩大利用外资的动力不足、抓手不够等问题,投资软环境不佳,深化改革有阻力,简化行政管理不到位、外资管理模式创新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中国作为投资地的整体吸引力。

对于中国这样走过赶超式、压缩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大国,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下,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必须全面提升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制度在内各类要素的整体素质。虽然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上升是必然趋势,但不论从国家层面应对工业4.0时代实体经济领域新一轮高层级的国际竞争,还是从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造业高质量外资及其蕴含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机会都不容忽视。通过吸收高质量的外资,有助于强化竞争效应,挤出低水平产能。同时,有针对性地利用外资服务于“补短板”,尽快形成示范和学习效应,

促进政府与企业之间、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多样化、良性互动,从而切实扩大有效供给,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三) 塑造利用外资新优势的建议

从人口规模和工业化发展水平来看,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内制造业仍有巨大市场和发展空间。要素成本优势持续弱化引发的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势必对国内就业形势和地方经济发展产生冲击。为此,一方面要尊重福耀玻璃等企业“用脚投票”的投资决策,特别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撤离中国,做好“善后”工作;另一方面,对资本流失带来的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风险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避免因经济过快“脱实向虚”、资本流失导致中国制造“未强先空”、“快盛快衰”。

(1)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政策透明度。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外资政策和管理制度对于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甚至是维护中国政府公信力至关重

要。为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保持决策定力，以落实“新20条”为契机，不断提高政策制定实施的科学性、创新性和连续性，切忌朝令夕改，忽松忽紧。近期应把政策功夫下在改善营商环境上，多渠道加强宣传，引导外商重塑信心。在战略上盯住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走向的同时，不宜走单纯靠拼优惠政策的老路，避免新一轮优惠引发政策寻租、利益冲突和各方质疑。

(2)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各类企业降成本。一要坚持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提高技术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延展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二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新一代通信技术，加快工业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全面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改善企业成本结构。三要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短期内以工业用电增量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大用户直购电，降低工业用电成本；不断增强煤炭企业降本增效能力，确保电煤、焦煤价格不出现连续快速上涨；全面推进油气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炼制、储运和销售环节效率，逐步降低成品油价格；创新体制机制，把页岩气开发和输送列入推广PPP模式的重点领域，改善天然气供应条件。四要进一步落实“放管服”，全面提升各级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能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3) 继续把制造业吸引外资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重点，加快培育利用外资新优势。细化《中国制造

2025》实施方案和相关专项规划，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参与互联网+、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瞄准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鼓励国内企业引进实力强的国外投资者共同研发面向工业4.0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同时，抓住机遇，鼓励一些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或差距不明显的领域开展颠覆性创新，引导企业投入商业模式和产业化创新，实现重点突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机遇和选择，进一步拓展合资合作空间。

(4) 创新领域外资方式。一要强化外资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放宽外国风险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限制条件，积极试点，推动金融部门协同配合，对跨境并购、上市融资提供更为便利、专业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降低外资并购的交易成本。二要加快国内创业园区、创客空间等“双创平台”对外开放，实行统一政策、统一待遇，着力吸引海外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加入“双创活动”，不断提高“双创”事业的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同时，引导国外投资者在国内设立规范的天使基金，带动国内创业创新育成机制不断完善，拓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融资渠道，提高风险管控能力，加快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完善创业企业的治理结构。三要依托“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建设，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扩展“以出带进”，通过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形成资本

对接融合的长效机制，全面提高要素互联互通的层级和水平。

(5) 推动园区整体对接，鼓励沿海地区外资优先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强信息沟通和要素对接，搭建市场导向的引资平台，增强投资中介服务功能，参照国际产能合作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外商投资园区，一对一地引进沿海地区的产业配套体系和园区管理模式，打造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产业集群；加快物流业等配套服务产业发展和商务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不断改善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区位条件；参照落后地区开发政策的国际经验，对中西部地区在财税金融、用地规划、市场准入、教育资源配置、人才引进等方面，考虑实行差别化政策，尽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6) 拓展引资渠道，吸引欧美中小企业来华投资。着眼于全球价值链整合优化，创新海外招商推介方式，为欧美从事专业化制造的“隐形冠军”式中小企业量身打造投资项目，吸引汽车关键零部件、精密仪器、精细化工等行业的专业化企业来华投资，补齐关键零部件的“短板”，促成相关领域中外中小企业之间的深入合作，加快形成更加完备、优质的产业链，完善外商投资的产业生态体系。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课题“美国制造业回归可能性及应对之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责任编辑：刘建昌)